

●翻译研究:译介学专题

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流变及启示*

李甫洛娃

(江苏海洋大学 连云港 222005/苏州大学 苏州 215123)

提 要: 范畴是反映事物最普遍、最根本特质的概念。文论范畴是文论思想的凝结,也是中西文论交流的关键,文论范畴的译介因此成为文论译介的核心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先后经历过释义法、威妥玛式拼音法和汉语拼音法的更迭,实现“译同”“译通”向“译异”的策略转变,表明中国文论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样态在北美逐渐回归并获得认可。全球的文化观念、北美的中国形象、译者的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译介目的等因素综合作用于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流变,其未来发展愈发趋向中国文论特性的体现,这为当前的中国文论输出创造良好的目的语环境。对中国译界而言,培养译者的多元文化观已经成为中国文论输出的理性诉求,唯此才能推动世界文论的平等交流和繁荣共生。

关键词: 中国文论; 文论范畴; 范畴译介; 译介流变; 文论输出; 多元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20)03-0074-7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20.03.012

The Category-translation Evolve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n North America

Li Fu-luowa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Categories are the concepts that reflect the most universal and fundamental quality of things. The categories in literary theories are not only the condensation of literary thought, but also the key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ategories in literary theories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of literary theory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Since 1970s, the category-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n North America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s from Paraphrase to Wade-Giles Romanization and Pinyin, and has realized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from Common-ground-seeking to Universality-seeking and Difference-reserving. This reflects the course of gradual return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s a unique theoretical form in North America. The elements such as global cultural values, Chinese images in North America,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identities of translators and their purposes of translation have comprehensively acted on the category-translation evolve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n North America, with the future tendency of increasingly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which creates a favorabl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the ongoing output strateg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To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ors'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has become a rational appeal of the output strateg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mote the equal exchanges and flourishing symbiosis of world literary theories.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categories of literary theories; category-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volvement; output

*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科研究基金项目“中国文论元范畴的跨文化译介研究”(2017SJB1689)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2017年度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JS-2017-267)的资助。

作者电子邮箱: lifuluowa@163.com

strateg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中的地位一直不容乐观,长期处于边缘文论的地位,这与中国文论传播不力、中西文论交流不畅的尴尬境地不无关系。季羨林(1996: 5-13)先生以多元文化观提出中国文论“送出去”的主张,并强调“送出有术”,意在以文论输入和输出的平衡来解决世界文论的失衡问题。然而,在文论输出中一味地归化就是甘愿接受他国文论的同化,这是当前中国文论输出的一大障碍。与此同时,文论范畴的语际转换一直是中文论译介及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道”“气”“兴”“象”“和”等中国文论核心范畴的北美译介流变更是管窥中文论译介发展的重要渠道。本文从译介学视角,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文论核心范畴在北美这一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译介变迁为参照,由点及面地追溯中国文论范畴在北美的译介动因及发展趋向,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的中国文论输出进行反思。

1 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流变及动因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中国文论的北美译介初具规模,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北美学者大多从中国文论的具体问题或某个侧面进行阐发或论述,使西方读者对中国文论的认知一度处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对中国文论整体性研究的开山之作是 1975 年刘若愚(J. Liu)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这本著作借助西方的文学理论框架对中国文论进行文本梳理和理论建构。随后,宇文所安(S. Owen)1992 年的著作《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以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采用文本讲述的形式,对中国文论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以上两部综合性研究著作对中国文论进行了语际普及与推广,极大地改善了北美学界重文本、轻文论的中国文学研究局面,继而使中国文论在 2001 年梅维恒(V.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 2010 年孙康宜(K. Chang)、宇文所安(S. Owen)联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占据应有的篇幅。从中国文论综合性研究专著的出现,到数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中国文学逐步以文、论并重的姿态展现于世。

随着北美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走向深入,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也随之变迁,有以“译同”“译

异”“译通”为策略的 3 种译介方法,分别为释义法(Paraphrase)、汉语拼音法(Pinyin)和威妥玛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它们贯穿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史。释义是直接向译语读者解释原语词句在上下文中的意味(sense)的一种方法(柯平 1993: 24)。释义法虽然在体现翻译的灵活性方面运用广泛,但在翻译原语中蕴含重要概念或文化信息的术语和范畴时应当慎重,因为可能造成原词语言、文化信息的遗失或误解,形成“同而不通”的局面。而我国于 1958 年法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正逐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拼写国际标准。威妥玛式拼音法则以罗马字母标注汉字,是目前国际影响最大的汉字标音体系,盛行于西方学术传统。这 3 种译介方法在北美语境下分别对应“译同”“译异”“译通”3 种译介策略,并代表译者的 3 种文化立场,即出发语立场、目的语立场和沟通两者立场(许钧 2015: 28),同时与中西比较研究的主要研究范式相呼应(董明 2016: 37)。而在学科特性方面,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以译介学为学科基础,有其独特的译法更迭规律与策略转变逻辑。首先 3 种译介方法并非同时出现,它们或单独、或组合地运用于 4 本不同时期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多种组合在不同时期、不同专著中的使用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自我身份综合作用下的合理选择。其次,由于不同的内外因驱动,3 种译介策略并非内涵一致,同一种译介策略也可能出于截然不同的译介目的。

以中国文论核心范畴的译介为例,1975 年版的《中国文学理论》以目的语释义为主来译介“道”“气”“兴”“象”“和”,分别译为 The Way (Tao) (Lieu 1975: 193), Spirit/Vital Force/Vital Breath (Ch' i) (同上: 184), Inspire/Inspiration (同上: 187), Sign/Image/Imagery (同上), Harmony (同上: 25)。其中只有“道”和“气”范畴的译文辅以威氏拼音,其他 3 个核心范畴均为不带拼音的目的语释义。1992 年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则以目的语释义为主,辅以威氏拼音,如“兴”Stirring (Hsing) /Affective Image (Hsing) (Owen 1992: 663), “象”Image (Hsiang) (同上: 663), “和”Harmony (Ho) (同上: 663)。较为特殊的是“道”和“气”范畴的译介,“道”通篇释义为 The Way (同上: 665), “气”则始终运用威氏拼音 Ch' i

(同上: 662)。至 2001 年,《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中国文论范畴译介以威氏拼音为主要译介方法,辅以目的语释义,如“气”Ch' i (breath/spirit/concrete manifestations) (Mair 2001: 1162) 和“兴”Hsing (Metaphor) (同上: 1166)。其他核心范畴及后位范畴仅以威氏拼音译介,如“道”Tao (同上: 1174)、“气象”Ch' i-hsiang (同上: 1162)、“兴趣”Hsing-ch' u (同上: 1166) 和“象形”Hsiang-hsing (同上)。2010 年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汉语拼音译法为主,目的语释义为辅来译介中国文论范畴,如“道”“气”“兴”“象”“和”分别译为 Dao (Chang, Owen 2010: 663), Qi (Breath, Vitality) (同上: 675), Xing (Poetic Inspiration) (同上: 683), Xiang (Image) (同上: 682), He (同上: 667), 这标志着汉语拼音在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史上全面登场。

威廉斯(R. Williams)认为,文化观念是“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发生普遍而重大的变化从而引起人们的一种普遍反应时,文化观念就出现了”(威廉斯 2016: 220 - 226)。纵观与 4 本典范著作相关的国际社会环境,重大变化层出不穷。作为文化思维的产物,文化观念以文化实践的方式在社会中实现,形式上分为语言化和非语言化,地域上又分为民族文化观念和世界文化观念。翻译作为文化观念的语言化形式反映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文化观念,同时也通过译介效果强化、巩固特定文化观念。一种普遍的文化观念系统要求译者通过选择译介方法和译介策略反映其内容,并以译介效果实现特定文化观念的既定性和条件性(崔平 2016: 123)。美国的中国形象在近半个世纪几乎是每 20 年发生一次转变,时而“浪漫化”,时而“妖魔化”,总体来说会因地缘政治等原因表现出友好,也会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疏远(姜智芹 2010: 97),这些皆为影响中国文论范畴在北美译介的重要外部因素。

作为译者的内部因素之一,文化身份在文化全球化时代很难单一存在,一般以自我文化为核心,同时兼容他者文化,美国和中国在这一点上都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译者的文化身份意识需要异质文化来激发,当中国文论作为“他者”文化出现并冲击西方文论时,译者的主体文化身份觉醒,并在译介目的中得到印证。除文化身份之外,译者还有一种共同的社会身份,即知识分子身份。葛兰西(A. Gramsci)曾提出“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认为知识分子以知识和思想的方式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成为文化的建设者、组织者和劝说

者,通过提供特定意识形态,确保文化的稳定性,维护民族文化身份(李震 2004: 57)。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是建立一种新社会、新文化、塑造新人的中坚力量(葛兰西 2000: 77)。译者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一员,在缔造社会文化观念和意义规则中体现自身价值,并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历史延续性。由此可见,全球的文化观念、北美的中国形象、译者的文化身份、社会身份与译介目的综合作用于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活动,是推动其不断演变的主动动力。

2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 两种“译同”

1975 年,北美华裔学者刘若愚出版《中国文学理论》一书,此书由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的人文研究奖基金资助,始作于 1971 年春,大部分研究于 1971 至 1972 年间进行,最终完成于 1973 年夏(Lieu 1975: vii)。在此期间,中美正进行政治、经济的全面冷战,社会主义中国受到遏制。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缺乏接触,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主要基于怨恨、想象和猜测(姜智芹 2010: 97)。同时,刘若愚的华裔文化身份和知识分子社会身份共同作用于他的译介实践,以融合中西为主要译介目的。他声称《中国文学理论》的直接写作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阐明中国文论,因为当时许多重要的批评概念语义模糊,主要的批评理论未经论述(Lieu 1975: 4)。他以西方文论的框架梳理中国文论,尝试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更为确切的道路(同上: 6),并形成可能的世界文论为最终目标。在范畴译介方面,刘若愚从中国文论范畴的多义性出发,主张根据上下文译介文论范畴的主要概念,而非追求同一范畴译介的前后一致,力求为西方读者说明同一范畴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内涵,例如“气”范畴 Spirit/Vital Force/Vital Breath (同上: 184),“兴”范畴 Inspire/Inspiration (同上: 187),“象”范畴 Sign/Image/Imagery (同上)。中国文论核心范畴中只有“道”和“气”范畴的译文辅以威氏拼音 Tao 和 Ch' i,其他 3 个范畴译本均为不带拼音的目的语释义。可见,刘若愚虽身处北美,其文化身份仍以中国为核心,心存中国文论的本真,并将中国文论范畴置于动态发展中观察。同时,刘若愚的“有机知识分子”社会身份决定其推广中国文论、促进中西融合的初衷,本质上服务于“中国文论输出”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也间接参与美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刘若愚融合中西文论的愿

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专注中国文论范畴的释义性译介,即用西方的语词解释中国文论范畴。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化翻译,是对目的语文化的妥协,也是中西文论交流初期的无奈之举。释义性译介确实大大促进西方读者对中国文论范畴的理解与接受,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达到预期效果。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关系的坚冰被打破。宇文所安于 1980 年前后着手写作《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于 1992 年出版。写作伊始正值中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之融洽前所未有,中国在北美树立空前的正面形象。同时期,萨义德(E. Said)在其 1979 年的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中深入阐释“西方文化霸权”对非西方国家的想象与扭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时,宇文所安从西方文化视角体悟中国文论并写就《中国文学思想读本》进行中国文论的美国本土化探索。他于 20 世纪 90 年代曾经说过“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主要是为了美国的文化建设,而不完全是为了对中国文化发言”(张宏生 1998: 118)。本着服务本土文化、推动美国文化建设的译介目的,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核心范畴译介以目的语释义为主,分别译为“道”The Way(Owen 1992: 665)、“气”Ch’i(同上: 662)、“兴”Stirring(Hsing)/Affective Image(Hsing)(同上: 663)、“象”Image(Hsiang)(同上)、“和”Harmony(Ho)(同上)。宇文所安对中西文论范畴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西方文论对范畴“定义”的追求与中国文论范畴中“定义”的缺席。他呼吁尊重中国文论范畴的模糊性,指出中国文论范畴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因此很多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意义(同上: 5-6),如“兴”范畴作“兴发”来讲译为 Stirring(Hsing),但作“比兴”来讲则译为 Affective Image(Hsing)。然而西方文化思维使宇文所安会不自觉地陷入对“精确定义”的追求,以至于在译介实践中往往忽略中国文论范畴的动态发展过程。如“象”范畴被简单泛化为 Image,而“象”范畴的汉语内范畴化过程实际上经历“哲学之象”“礼乐之象”“审美之象”3 个阶段,分别对应 Sign,Form/Shape,Image/Imagery 这 3 层意义,绝非 Image 一词可以简单概括(李甫洛娃 2018: 52-56)。因此,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范畴译介由其西方文化思维和服务美国本土文化等自身动因主导。作为美国社会“有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对异质文论范畴进行本土化改造,以西方文论范畴释义,甚至泛化中国文论范畴,以确保西方文论的稳定性,履行建设美国文化的历史使命,维护自我文化身份。

虽然刘若愚和宇文所安都不约而同地采用目的语释义为主的归化译法,但却出于不同的文化身份、社会身份以及译介目的。处于弱势文化身份的刘若愚迫切希望中国文论范畴融入西方文论并获得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他的“译同”策略目的在于得到他者文论的“文化认同”;而宇文所安的强势文化身份使他更希望从非西方文论中汲取营养以滋养西方文论,他的“译同”策略目的在于“同化”异质文论。两者都为服务西方读者而采用归化译法,但就译介目标而言,刘若愚以可能的世界文论为兴趣,宇文所安则以更完善的西方文论为旨归。

3 21 世纪初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从“译通”到“译异”

随着中国的崛起,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中国形象以“中国威胁论”为主导,包括军事、经济、文明 3 方面的“威胁”(姜芹芹 2010: 89-95),这一论调明显夸大中西文明的冲突,忽视全球化视野下的交流与融合趋势。同时,全球化研究的重心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发生文化转向,形成文化全球化的研究趋势,以詹姆斯(F. Jameson)1998 年的《全球化的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一书为代表。但文化全球化初期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明显,对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中的价值尚未明确,非西方文化在西化的同时逐步丧失文化差异性,全球文化走向单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文论范畴译介以“译通”策略为导向。

2001 年,梅维恒编写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是迄今为止在北美学界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该书按年代和主题编排,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是其中的一章。梅维恒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大量的新兴研究使编纂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为一件必要但困难的事(Mair 2001: xi),而此书的目的是阐明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特征和加深西方读者的了解。他也希望借此书来纠正西方传统对中国文学的偏见,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学的多样与活力,并以此证明各国文学传统都有自身的魅力(同上: xiii)。可见,梅维恒具有符合时代特点的全球化视野。书中指出,当时的写作背景是中国文化日益被大众所接受,人们出于多种目的需要全面了解中国文学史。该书与梅维恒在 2000 年编写的《哥伦比亚简明中国文学手册》(*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均采用威氏

拼音来译介中国文论范畴,因为几乎所有英语语言国家的主要学术研究型图书馆、大量有关中国文学的英文学术写作以及绝大多数汉学家都采用这一“通用”的拼音系统。这种译法源于翻译会通范式中的“会而观通”策略,即以与原语相似的译语资源打通原文(张德让 2010: 69)。反之,如果采用其他拼音系统,如汉语拼音,势必会令没有汉语学习背景的西方读者大为困惑(Mair 2001: xxv-xx-vi)。因此,中国文论范畴“道”“气象”“兴趣”“象形”直接译为威氏拼音 Tao(同上: 1174),Ch' i-hsiang(同上: 1162),Hsing-ch'u(同上: 1166),Hsiang-hsing(同上)。而“气”和“兴”范畴除威氏拼音译本之外还辅以目的语释义,译为 Ch' i(breath, spi-rit, concrete manifestations)(同上: 1162)和 Hsing(metaphor)(同上: 1166)。同时,考虑到当时汉语拼音已在媒体和汉语入门课程中广泛使用,该书将汉语拼音和威氏拼音进行对照,这是范畴译介策略由“通”向“异”的转变,是顺应社会语境的一大进步。

这本著作与 1992 年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相比,一方面,威氏拼音在中国文论范畴译介中的单独使用比例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编者对西方读者的中国文论范畴认知水平充满信心;另一方面,梅维恒和宇文所安这两位美国学者有一致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也同样结合目的语释义法和威氏拼音法进行中国文论范畴译介,但这两种译法的主次关系发生变化,从宇文所安的目的语释义为主、威氏拼音为辅,发展为梅维恒的威氏拼音为主、目的语释义为辅。这体现出美国视角向全球化视角的转变,译介目的由宇文所安的服务美国文化转向梅维恒的服务世界文化,与同时期的文化全球化观念颇为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全球化初期的世界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梅维恒以西方学术传统“通用”的威氏拼音为标准,力求与西方现有的学术著作保持一致。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文化全球化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西方中心论逐步被打破,非西方文化的价值得以重估。文化全球化的多元化走向推动非西方文化意识的觉醒,为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阶段的中国文论范畴译介也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特点,以“译异”(即尊重差异)为主要译介策略,汉语拼音开始作为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拼音体系在北美推行。2009 年,汉语拼音作为译介辅助首次出现在《朗文世界文学选集手册》(*Instructor's Manual to Accompany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中,核心范畴“道”和“气”分别译做 The Way(Dao)(Damrosch, Pike 2009: 99)和 Ch' i(Qi)(同上: 148)。

随后的 2010 年,北美华裔学者孙康宜和宇文所安联合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另有十多位北美汉学家参与编写,意在创造一种文化历史或一部文学文化史(Chang, Owen 2010: xvi)。这部著作以全球化语境为契机重写中国文学史,试图打破欧美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某些时代、某种文体的片面认识,并将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展现给世界读者(孙康宜 生安锋 2005: 99)。这部以文学史实为基础、力求还原文献学历史真实面貌的著作在中国文论范畴的译介方面也做到“还原本真”,表现在以汉语拼音为主对中国文论范畴进行译介,并以目的语释义作为补充。中国文论核心范畴的汉语拼音译本首次被全面介绍,分别译为 Dao(Chang, Owen 2010: 663),Qi(breath, vitality)(同上: 675),Xing(poetic inspiration)(同上: 683),Xiang(Image)(同上: 682),He(同上: 667)。“道”范畴与“和”范畴的译介只有汉语拼音而不附释义,说明这两个范畴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已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其他 3 个核心范畴的译介以汉语拼音为主、目的语释义为辅,体现出中西文论交流对中国文论本真的充分尊重与重视。汉语拼音的全面登场给我们两个讯息:一方面,中国的语言和文论在北美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以汉语拼音译介的中国文论范畴对西方读者来说不会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此书的编者希望西方读者更关注中国文论范畴的本真,同时提醒读者目的语释义译本与中国文论范畴本身有区别,不能完全对等。该书除给出中国文论范畴的汉语拼音之外,还在书后附上对应的汉字,以便有意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西方读者能够直面中国的语言与文化。此书与其主编之一宇文所安在 1992 年编写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相比跨越两大步,译介方法从目的语释义为主、威氏拼音为辅转变为汉语拼音为主、目的语释义为辅,译介目的也从服务本土文化转向服务全球文化,又从全球文化单一化转向全球文化多元化。宇文所安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并没有改变,但是美国的中国形象和全球的文化观念发生了变化,新时期的译介目的也随之改变。这是译者主观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也是外在客观环境在译者主观的反映。

4 中国文论输出的译介启示: 译者多元文化观的培养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先后经历释义法、威妥玛式拼音法、汉语拼音法的更迭,分别反映译者或编者的独特视角,即刘若愚的文化融合视角、宇文所安的本土文化视角、梅维恒的全球文化视角以及孙康宜的多元文化视角。刘若愚以文化融合视角用西方语词来定义中国文论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中国文论范畴的本来面目,忽略中西文论范畴无法完全对等的事实;宇文所安以本土文化视角将中国文论范畴再范畴化为本土文论范畴,实现西方文论对非西方文论的借鉴和利用;梅维恒的全球文化视角强调世界文论范畴的共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妥协于目标读者的认知图式和“共通”的西方学术标准;孙康宜的多元文化视角则在给出中国文论范畴的再范畴化释义之外凸显中国文论的特色,推动西方读者直面中国文论范畴的本真,并在多次碰面中加深对范畴内涵的理解。这4种文化视角对中国文论范畴的译介方法进行不同选择,重要区别在于对中国文论范畴特性的重视程度,这一程度在北美译介发展中依次上升,体现出中国文论范畴与北美译介史的关联性和连续性。

正如国内学者王克非所说,观察翻译既要注重文本比较,又要考虑背后的社会文化(王克非2014:52)。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变迁与全球文化观念以及美国的中国形象演变基本保持同步,也是译者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译介目的的体现。无论译者以何种视角、采用何种译介策略和方法,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都为世界文论补充新的内容,不断显现的中国文论特性也推进世界文论的多元化进程。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世界文论的构建必将是一个逐渐尊重文论差异的过程。对中国译界而言,培养译者的多元文化观已经成为中国文论输出的理性诉求。新形势下的中国文论输出应注重译者多元文化观的培养,从而在文论译介中寻求中国文论特性的凸显,并以此为基础寻求中西文论的交汇。

多元文化观的培养首先要求译者具有“文论自觉”。一方面,译者应对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和特色有动态的考量。中国文论体系庞大、结构复杂,中国文论范畴的单一内涵并不存在,译者只有寻求历时、共时相结合的多维解读才能不断提升对中国文论的认知,从而提高文论译介水平。另一方面,译者应对中国文论的历史地位、文化作用和发展规律有正确的把握(宋炳辉2019:104-106)。出于多种译介需要,北美译者往往简化、狭义化甚至忽略中国文论特性相关的重要问题,

这意味着中国文论的北美译介一直是在“需求化”基础上进行。按需求来译介的中国文论并未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这样的译本并不成熟。中国文论输出的译者只有深入文论的概念梳理和内涵挖掘,才能构建清晰的中国文论认知图式,从而在文论译介中对其认同、继承和创新。

多元文化观的培养还要求译者树立“文论自信”,即坚定文化立场、明确译介目的,并以此为依据选择译介策略。坚持出发语文化立场、深入研究中国文论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是建立文论自信的内在要求。中国文论输出的起点与归宿都在中国,尤其应立足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与现代转型,否则文论自信就会失去根基。这一根基的建立也有赖于中国文论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不仅关乎学术的正本清源,更关乎学者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中国学人应当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文论的范畴体系建设仍在进行,文论特性仍缺乏整体性描述,确定性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因此,译者文论自信的树立也对中国文论界提出不懈要求。

多元文化观的培养在译介实践中表现为归化为主向异化为主的策略转变。异化论的转变既是客观环境的要求,也是主观文化立场和译介目的的反映。随着中国文论北美译介的深化,西方读者开始关注这一不同的理论样态,他们对“异化”的中国文论已有一定的接受能力,也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文论的本来面目,体会其独特魅力,这为中国文论输出创造良好的目的语环境。随着文化多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文论输出的异化趋势虽然开始显现,但仍处于“未完成”状态,西方读者还不能适应绝对的异化翻译,这就需要译者根据不同译介背景和不同接受程度调整异化与归化的比重。但中国文论输出的未来趋势必然是异化为主,并逐步增加其比例。

5 结束语

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正处于由“译同”“译通”向“译异”转变的过渡期,这一转变是时代、社会、意识形态、译者身份和译介目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也是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中国文论输出本质上是“中国文论不断获得世界认可的过程”。相比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时期的中西文论交流,中国文论在当今的北美受众更广,读者人群更为多样,其文论特性与共性也逐渐被发掘与接纳。中国文论范畴的北美译介流变体现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对译介实践的影响,也是译介实践对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等国际发展形势的反

映。如此看来,中国文论输出应超越译介领域,兼具社会意义与时代特点。

参考文献

- 崔平. 文化观念的本体结构与文化比较的方法[J]. 哲学研究, 2016(12). || Cui, P.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of Cultural Concepts and the Methods of Cultural Comparison [J].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16(12).
-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7. || Fei, X. -T. *On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by Fei Xiaotong* [M]. Beijing: Qunyan Press, 2007.
- 葛兰西. 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M]. 武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Gramsci, A. *An Unfinished Political Thought: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by Gramsci* [M]. Wuh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0.
- 季羨林. 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 文学评论, 1996(6). || Ji, X. -L. A Brief Discussion o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ies [J]. *Literary Review*, 1996(6).
- 姜智芹. 美国的中国形象[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Jiang, Z. -Q. *Chinese Images in America*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柯平. 释义、归化和回译——三谈变通和补偿手段[J]. 中国翻译, 1993(1). || Ke, P. Paraphrase, Naturalization and Retranslation — the Third Discussion on the Means of Flexibility and Compensation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993(1).
- 李甫洛娃. 译“象”: 从术语译介到范畴译介[J]. 中国翻译, 2018(2). || Li, F. -L. -W. Translating *Xiang*: From Term Translation to Category Translation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18(2).
- 李震.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J]. 学海, 2004(3). || Li, Z.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by Gramsci [J]. *Academia Bimestrie*, 2004(3).
- 宋炳辉. 外来启迪与本土发生: 译介学理论的中国语境及其意义[J]. 外语学刊, 2019(4). || Song, B. -H. Foreign Inspiration and Local Happening: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Significance of Medio-translatology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9(4).
- 孙康宜 生安锋. 新的文学史可能吗[J]. 清华大学学报, 2005(4). || Chang, K., Sheng, A. -F. Is the New

History of Literature Possible [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2005(4).

- 王克非. 翻译需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来认识[J]. 外国语, 2014(6). || Wang, K. -F. Translation Needs to Be Understood from Two Aspects: Language and Culture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4(6).
- 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 Williams, R. *Key Words: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许钧. 历史的奇遇——文学翻译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Xu, J. *An Adventure of History —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张德让. 翻译会通论[J]. 外国语, 2010(5). || Zhang, D. -R. On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0(5).
- 张宏生. “对传统加以再创造, 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J]. 文学遗产, 1998(1). || Zhang, H. -S. “To Re-create the Tradition Without Distorting It”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tephen Owe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J]. *Literary Heritage*, 1998(1).
- Chang, K., Owen, 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Damrosch, D., Pike, D. *Instructor's Manual to Accompany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M].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9.
- Jameson, F.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ieu, J.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Mair, V. *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air, V.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Owen, S.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aid, E. *Orientalism* [M]. New York: Vintage, 1979.

定稿日期: 2020 - 03 - 16

【责任编辑 王松鹤】